

■新作聚焦

# 李延国、李庆华报告文学《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

## 信仰的力量与历史的意义

□贺仲明

非常有必要的重要工作。

在倡导信仰的过程中,历史要承担重要的任务。因为其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确实有无数坚定的革命信仰者,如瞿秋白、方志敏、赵尚志等,他们怀着伟大而美好的理想信仰,致力于改变严重落后而不平等的旧中国,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的新国家。为此,他们将全部的自己投身其中,许多人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虽然他们的事业在后来部分地受到某些功利主义的玷污,但却无损其信仰的光荣。在今天,回顾这些历史能够唤起人们对崇高信仰的记忆,重新体会信仰的内涵和价值。其二,在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中国近现代历史受到多种遮蔽和曲解,其中也包括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真相被遮蔽,使许多人丧失了对历史的信任,也使历史本身的庄重和神圣受到了伤害。“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特别崇尚历史价值的中华文化中,历史的庄严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牢记历史、信任历史,应该是当前社会信仰重建的一部分。所以,还原历史真相,再现革命信仰的真实状况,既是对历史信任的恢复,也同时是对信仰的重新构筑。

李延国和李庆华合著的报告文学《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泰山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的价值就在于它从还原革命历史的角度,揭示了信仰的部分真相,更对革命者的信仰进行了大力歌颂。作品对革命信仰的还原和赞颂,有助于针砭和改造我们这个信仰匮乏的时代,为时代文化建构起一股信仰的精神。

这首先体现在作品对著名革命者信仰的展示上。从这个角度看,该作品选择的题材非常典型。作品所谓的“根据地”指的是冀鲁豫边区,这是一个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革命老区,许多著名革命家在这里工作过,也培养了许多著名的战斗英雄,可以说,这里既是红色老区,也是信仰者的圣地。作品将中国革命的发展历史与革命者的生活相交织,叙述了一个个令人感动的关于革命信仰的故事。其中有战争中的勇猛、机智和牺牲,也有生活中的奉献、追求甚至委屈。这些革命者的名字不同,遭遇和经历不同,但对革命的信仰却是高度一致的,从而共同建构了一座革命历史的红色丰碑,也筑起了根据地的信仰之堤。

正如该著在扉页上引用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崇

在崇尚历史价值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历史的庄严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牢记历史、信任历史是当前社会信仰重建的一部分。还原历史真相,再现革命信仰的真实状况,既是对历史信任的恢复,也同时是对信仰的重新构筑。

《根据地——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从还原革命历史的角度,揭示了信仰的部分真相,更对革命者的信仰进行了大力歌颂。作品对革命信仰的还原和赞颂,有助于针砭和改造我们这个信仰匮乏的时代,为时代文化建构起一股信仰的精神。

近年来,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的伦理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精神信仰出现了严重的缺失。经历了20多年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许多人已经丧失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金钱、利益成为他们生活的首要目的。在许多人那里,信仰、崇高、理想甚至已经成为了被嘲笑和亵渎的对象。如此严重的信仰缺乏,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是非常不健康的,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民族精神的下降,进而可能导致全民性的精神混乱。没有信仰的支持,一个政党难以保持自身的稳定,更难以持续得到大众的信任,带领国家向前发展。事实上,当前社会出现许多道德问题的背后都多少可以归咎于信仰的匮乏。因此,无论是从国家还是从执政党的角度,重新阐释和倡导精神信仰,都是一项

■创作谈

在我古稀之年,接受了反映冀鲁豫革命根据地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的写作任务。我不是党史专家,也不是军史专家,面对着如山的史料,我只有从学习开始。

在与李庆华先生共同采访、查阅史料、写作的过程中,我收获了震撼、感动和思考,革命先辈的无私、刚毅、壮烈、崇高的品格和对信仰的坚守,让我在晚年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冀鲁豫根据地的军民在战争年代生死与共、心怀大义、不畏强敌、慷慨献身的精神,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长征的精神一样,也是人类文明的伟大遗产。

写作中,我常常老泪纵横,情不由己。南下干部夏页文,廉洁勤政,心系百姓,提出要“老百姓微笑着生活”,提出“家门随时为民开”。他把百姓吃水难、吃饭难、行路难、乘车难,当做大事来办。农场工人、理发师、清洁工,都成了他的朋友。每年元旦,他常带上酒到容易被人忽略的火葬场,与那里的职工一起过节。他去世后,遗体被送到火葬场时,全厂职工泣不成声。工人们知道,夏老者喜欢干净,一个工人爬到焚烧炉里,把炉子擦得干干净净,他从炉子里出来时,止不住眼泪横流,滴在炉膛里。另外一个工人说:“这不行,你把眼泪掉到里面了,对夏老者不恭敬。”这个工人又爬进去,擦呀擦、擦呀擦……

写到此,我情不自禁写下了以下文字:“捧一掬泪水送给你,不是因为你的壮烈,而是因你的崇高! /捧一束鲜花献给你,不是因为你的伟大,而是因你的平凡! /唱一曲悲歌怀念你,不是因为你的逝去,而是因你的永生! /我的先辈,我的同志,我的导师! /我永远的冀鲁豫的浩然正气;我永远的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 /忠诚的道路,忠诚的远行。穿过枪林弹雨,走过血浸的泥泞,夏老者,你的背影,已变成不朽的丰碑,矗立在南国的土地上,标记着一部伟大史诗的里程……”我眼眶湿润,问李庆华:“你愿意和我一起,用中国传统的最高礼仪,给夏老者磕个头吗?”李庆华回答:“愿意!”我们在这一段文字下加上了“作者叩拜”四个字,终于抒发出了胸中对这位先辈崇高精神的敬仰。

在菏泽市曹县红三村的三位耄耋老人,提醒了我们“根据地”的存在。当年红三村一千多名群众为了救一个八路军波洒热血,一个八路军为了救一千多名群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人间什么样的血缘关系?

那位八路军战士名叫秦兴德,他是人民的好儿子,是中华民族的真勇士,是冀鲁豫边区为中华民族留下的世代的英雄记忆。红三村的乡亲们,你们家境贫穷,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们在强敌面前显得弱势,可你们却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红三村的三位耄耋老人,当时还是十四五岁的少年,他们亲眼目睹了秦兴德牺牲的悲壮场面。今天他们在迟暮之年,惟一的心愿就是要给烈士立碑,让后代永远记住至今还长眠在红三村村头的那位八路军战士和他的精神。

1938年5月,菏泽古城被攻陷,日军士兵一天之内屠杀两千多名同胞,屠城后又分兵到城外的村庄。每到一村,就把所有的村民集中到村外农田里,逼迫村民低头跪在地上,有人抬头,立即击毙。炎黄子孙并非没有力量,而是没有一面旗帜把他们召唤起来。1938年,党中央派八路军到冀鲁豫,建立平原抗日根据地。鲁西南人民在共产党举起的抗日火炬下,拿起武器,浴血奋战。

一寸土地一寸血,一座村庄一面旗。冀鲁豫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八年间经历重大战役数十次,大小战斗6363次,拔掉日伪据点376个,军民共消灭日伪军19万人。根据地人民与共产党、八路军生死相依,出现了许多悲壮、坚毅、崇高的故事。同时,根据地人民为了支援子弟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儿,送他上战场。”

根据地,已经不是一个年代概念、军事概念、政治概念,她是“人民”的化名,是永不落选的“人民代表”,是共和国血染的基石。她还有另一个名字,是我们永远的“母亲”。

# 根据地——我们的母亲

□李延国



## 宏大生活下的拷问

——读刘仁前“香河三部曲” □吴萍

九十年代江淮农村的轰隆巨变促进了楚县的现代化进程,也催生出一个乡镇的基层政治标本。柳成荫的爱与柳春雨的爱不同,陆小英的爱与琴丫头的爱不同,各自“爱得不自由”,却都有不同的时代烙印。至《残月》,柳家第四代柳永的情感纠葛及社会里摸爬滚打的历程都被笼罩在时代浪潮下。同样,刘仁前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时代”,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何以安顿好自己的灵与肉?柳永个人的焦虑已经成为我们群体性的焦虑。

有人说《香河》是“一卷烂漫而感伤的风俗画”,《浮城》是“极具地域风情的浮世绘”,“风俗画”和“浮世绘”都因刘仁前的目光是朝向社会和时代,紧紧附着社会变奏的脉搏,为几代人寻找心灵和精神的病状。鲜明的时代性让三部曲显得宏大丰厚,这得益于刘仁前富足的生命经验,更关乎敏感的心眼和悲悯的大情怀。

“在我们这样的国度,关于两性关系的正解不多”,刘仁前曾就两性关系有“戏言”。《香河》《浮城》和《残月》,明晃晃的情爱故事俯首皆拾,时而粗粝,时而温柔。三奶奶与王先生,柳春雨与琴丫头、杨雪花,香元与来娣子和香玉,柳成荫与陆小英,柳永与田月月、秦晓月和吴梦月,小说呈现出很多不同样式的两性关系。他们之间有纯美之爱,有暧昧之爱,有欲望之爱,还有凝聚着亲情的夫妻关系。比如,《香河》中的三奶奶幼时做童养媳,少女时与别人相爱诞子,终于完成嫁娶后却意外地丧子丧夫。这一旧时代女性天真烂漫,有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然而又胜出了萧萧一份坚韧和知足。来娣子身上透着入骨的真挚,她知道香元的“惦记”太多,却只在意自己的一腔真情。她爱这个男人,才会动情地坦白最大的美梦就是跟香元一觉睡到天亮。柳春雨的年代,女人们还得遵循三从四德,拼命追求真爱是遭人鄙弃的。但在《香河》中,琴丫头、水妹和杨雪花的身上无一例外地亮出果敢甚或偏执,敢爱敢恨到悲剧落幕,让看者为之唏嘘。

《香河》中的男女多数别着“文盲”的标签,这让无法对两性关系做出深刻的个人反思。他们卑微地活在乡村一隅,却自有动人处。等到下一代的柳成荫和陆小英,拆下“文盲”的他们俨然对爱情和欲望掌管“话语权”,却依然如自己的父母一样“不美满”。小说没有交代“苏华”替代“陆小英”的原因,只让柳陆二人在中年上演“婚外情”。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老情人关系,柳陆的“两性关系”被刘仁前置于如此复杂的关系中追索,也还是逃不过悲剧结局。

在改革春潮涌动的当下,田月月天真烂漫,吴梦月风情入世,秦晓月知性优雅,柳永与她们错综

的亲密关系,隐射着什么?与《香河》中的女人们不一样,被文明驯化过的3位女性都有反思的头脑,都能看到如影随形的“残月”。处在圆心中央的柳永,受金钱和身体本能的双重诱惑,一路迷失在追求的旅途中。在追求爱情这方面,他比自己的父亲、爷爷更少主动性,几乎是“被失败”。其实,柳永的失败即是你我的失败,受制于膨胀年代,更有可能遇到“空心”的爱,而无缘得到来娣子与香元之间的那种真情实意。小说中秦晓月辞职和柳永南下,算是开放性的结尾,是刘仁前留给你我的思考。

撇开文本的内部发生,从《香河》到《浮城》,再到《残月》,不难看出刘仁前的小说笔法亦有大变化。《香河》的魅力在于描述了风俗美与人性美,刘仁前注意到香河自身的古典情境和农耕时代属性,所以故事讲得舒缓悠远,但语、农事、婚俗以及一些旧的生活方式夹杂于其中别添诗意。最令人惊异的是,《香河》中出没的几十号人,一个个醒目地镶在读者的记忆版图中。寂寞者、愚笨者、憨厚者和精明者,凑成一幅热腾腾的香河图。此外,明亮的汪曾祺风格,流淌在《香河》里的氤氲水汽、真纯至美,或是水乡姑娘们特有的爽朗和敞亮身上。“写小说就是写语言”,《香河》也很遵循这一原则。

到了《浮城》,刘仁前不再让人物多说二话或使方言,“香河”中的群像减成数得过来的官场中人。叙事节奏一改《香河》的舒缓为紧凑,“双线”布置故事结构,社会格局大动下官场的风云际会是其一,柳春雨和陆小英的重逢是其二。楚县大过香河,不同于香河共用一个“朋友圈”,刘仁前需要预设出很小的关系圈,周密其间,串通情节。

《残月》不同于《香河》的“潺潺意”,又比《浮城》加快节奏,以“残月”这一意象先行,昭示年轻人内心生命的“残缺”。被攘入月城烟火红尘中的柳永和“月们”,他们的际遇与当下人有着更大的交集。“残月”这一古典意象屡次出现在小说中,最终,咖啡馆里秦晓月暗吟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将这种“残缺”意味发挥到极致。以“残月”为核心意象,发掘物欲世界下的人心,刘仁前也就剔出了现代人的问题内核以及我们共同的症结所在:当我们抢到足够的银子时,为何还会倍感虚脱?冰凉的“残月”为何总像一把对准心口的枪?

“为故乡和故乡人宏传”是刘仁前交出三部曲的赤忱初心,私以为,宏传几千万字其实是刘仁前给自己的交代,有着马力强劲的内心驱动力。对准个人的洞口使劲挖掘是能挖到全人类的,刘仁前正是对准自己,带着读者循着个人经验史,带我们一起“看见”,看见温软的香河、时代的诡谲和人心的褪色。

■评论

### ■新作快评 阿来中篇小说《三只虫草》 《人民文学》2015年第2期

## 慈悲是寻找已久的宝藏

□钟正林

《三只虫草》是阿来继《遥远的温泉》之后捧出的又一部中篇小说。12年前,我读过《遥远的温泉》,少年的“我”对于远方的神往和牧马人贡波斯甲对于卓尼温泉的神奇描述,与现实生活中的温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是一个无法释然的纠结,生态堪忧和文明失落深深地影响了我对于小说的最初审美。

在《三只虫草》中,少年桑吉是小说中的亮点,也是作家多维度倾力刻画的人物。纠结和小聪明是作家把握人物身上的两个特点。桑吉之所以逃学挖虫草是想给姐姐买衣服,给表哥买手套,给多布杰老师买一罐剃须液,给娜姆老师买一罐洗发水,而文具盒里藏下了3只白胖的虫草只能卖90块钱。这成了他的纠结,之前他也曾有点纠结,“是该把这株虫草看成一个美丽的生命,还是看成30元人民币?”喇嘛的话让这个纠结很快就解开了,“如今世风日下,人们也就是小小纠结一下,然后依然会把一个个小生命换成钱。”然而,调研员的出现带来了新的纠结,桑吉用他的3只虫草换回了装虫草的箱子,调研员许诺下次来送他一套百科全书。这套百科全书成为了桑吉最大的纠结和梦想的出发点。一直到小说结尾,百科全书都未被主人公桑吉所有,而梦想却在发芽生枝。

在为桑吉塑形的过程中,作家用了两个词。一是“低调”,小说中曾两次出现。第一次是在桑吉第一次发现透明、娇嫩的虫草时。第二次是阿爸叫桑吉回学校去,桑吉给校长,实际上是给多布杰老师写信,“逃课多少天,我就站多少天。我知道这样做太低调了。”桑吉每次逃学回校后考试,别的同学都超过他。这也是他敢逃学去挖虫草的自信。另一个词是“概率”。在村长家抽签封堵路口防止外来人员进山来挖虫草时,桑吉想起多布杰老师在数学课堂上说过的一个词:概率。他出手,抽到了一根短棍。桑吉胜利了。原来,抽到长棍的人明天要去封堵路口,会耽误采挖虫草而遭受一定的经济损失。

桑吉的纠结和烦恼也是众多藏族孩子的纠结和烦恼。在刻画桑吉这个心地善良、“有点小天才”的少年形象时,作者用了两个人物来反衬:为了去网吧而偷钟卖给收荒匠的同学,和桑吉偷过牛的表哥。对于这两个人物,作家给予了佛性的悲悯和宽恕。多布杰老师感佩表哥后对桑吉说,“你现在帮不了他,只有好好读书,或许将来你可以帮他。”从此,表哥不再偷东西了。他当背夫,帮人背东西。但表哥最终还是因为帮盗猎者背藏羚羊皮而进了监狱。虫草季结束后,桑吉想去城里看表哥,他想给表哥买一双皮手套,还有棒球帽和项链,这些都体现出孩子的纯真和善良。

喇嘛是藏地必不可少的社会构成,也是阿来小说的必要构成。小说中的喇嘛说了很多夸奖桑吉天资聪慧的话,两人的精彩对话极富禅意机趣。喇嘛说,“河去了海里又变成了云雨,重回清静纯洁的启源之地。所以,我们不必随河流去往大海。”桑吉说:“我就想随着河流一路去往大海。”人各有志,桑吉坚持“不当喇嘛,我要上学!”或许,这就是解开桑吉这个人物的密码,也是作家将一个世俗少年一点一点雕琢而成的匠心所在。

调研员许诺的百科全书是桑吉最大的纠结,也使小说后半部的峰回路转。虫草季结束,桑吉回到学校向校长索要百科全书,校长却说调研员是送书给学校,而不是送给桑吉。桑吉对此耿耿于怀,特意去了一趟县城。他看着校长哮喘的老婆打着瞌睡,孙子撕下百科全书中的书页高兴地摇晃。小说结尾,桑吉给多布杰老师发了封电子邮件:“我想念你。我原谅校长了。”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桑吉的成长体现在他从纠结到释然的过程,以及对世界有了自己的认识。《格萨尔王》中的格萨尔王托梦告诉说书人,那寻找已久的宝藏叫做慈悲,在《三只虫草》中,慈悲延续到了桑吉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的身上。

从《香河》《浮城》到《残月》,前后10年,刘仁前交出了70多万字的三部曲。《香河》有这样一行卷首语:“谨以此书——献给我养我的故乡,献给故乡死去的和活着的乡亲们”。至《浮城》和《残月》,“故乡”无论是地理还是心理,都已跨越了小小香河缠绕的村庄,包含后来的“楚县”和“月城”。应该说,“故乡”是紧随小说几代人的命运变幻而迁徙和变大,幕后的操纵者只能是刘仁前,他在现实的个人轨迹中看到以柳家为首的一群人的跌宕命运。香河边、楚县里、月城中所发生的都是刘仁前的“故乡事”,充满着生活的烟火气。生活之下,大多数沉默,小部分喧哗,只有极少数敏感如他,对生活本身不惧不怵,一路追索。

在三部曲所拧成的不褪色的个人记忆链中,刘仁前试图钻进不断“换装”的外部世界,追问乡土传统伦理的坍塌,探索两性关系的正解,直面物质对人心的异化问题等等。

自《香河》起至《残月》,从一爿豆腐坊里的刘安然到末了远上南方寻倡的柳永,三部曲的时间线上站着几代人。他们在香河边彼此相爱又侵害,在仕途上角逐,在宦海中沉浮,同时又在欲海情波中推搡回避、寻死觅活。刘仁前看到他们身上既卑微又明亮的光,叫人记住了来娣子、陆小英和秦晓月这样的女人,香元、柳成荫和柳永这样的男人。

倘若把三部曲归为情爱小说,反对声应该不多,刘仁前有擅长写“情爱”的深情妙笔。柳春雨与琴丫头、柳成荫与陆小英、柳永与田月月,甚或偷腥“惯犯”香元与那些婆婆之间,都是“情爱”一种。很多小说家的“情爱”凸立文本之上,看得见男人和女人,看不见他们的“幕后”,人物所属的场所和社会都被小说家刻意虚化了。而在三部曲中的任一,每个人物都受制于社会和时代,美梦被唤醒,仕途被叫停,财路被阻隔,仿佛都肇因于幕后的“时代”这个刽子手。

在社会或时代的大视野下写小人物,刘仁前显然是在表达自己。《香河》写了一群人的故事,美好也残缺。最令我难忘的是香元,这个村支书的魅力正是其手中的“权杖”。在小小的香河,他成了一个“王”。1979年的“春天的故事”飘到《浮城》里的楚县,已有家室的柳成荫重逢初恋陆小英,引出断肠故事,最终以陆小英的溺亡和柳成荫的情场、官场双失意而告终。从《香河》到《浮城》,人物更新,场所也随之更新,“文革”后期尚存牧歌气息的农村变成了改革和转型中的县城。刘仁前在此中着力勾勒了官场形态:县委书记柳成荫怎么在老家建设中“高举寻吾契”,怎么跟上下官员和商人们打交道,怎么与往昔的爱人发展“婚外情”等等。上世纪八